

中國大陸知青受聘西雅圖學院系統總校長

2016年4月中旬,西雅圖學院系統(Seattle Colleges)宣佈,任命亞利桑那梅薩社區學院校長潘壽安(Shouan Pan, Ph.D)為西雅圖學院系統總校長,接替6月退休的總校長吉爾·維克菲爾德(Jill Wakefield)。潘壽安曾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當年農村的磨練讓他受益匪淺。

當官為的是讓年輕人受教育

潘壽安出生在中國安徽省,高中畢業後,作為知識青年被下放到安徽壽縣。在壽縣的兩年裡,他做過農民,插過秧,養過豬,養過雞,生活雖然艱苦,但潘壽安覺得很開心,學習了生活常識,也瞭解了中國農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為了養家糊口而辛勤勞作的勤勁。“文革”結束後,潘壽安參加了招生制度改革後的第一次高考,進入合肥工業大學學習英語專業。畢業後,潘壽安留校教書。1984年,潘壽安得到了出國進修的機會。於是,他於1985年前往匹茲堡大學進修,後獲得科羅拉多州立大學高校學生人事管理學碩士學位、艾奧瓦州立大學高等教育管理學博士學位。

畢業後,潘壽安在亞利桑那社區大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那里,他瞭解到美國的社區大學主要是為了服務社區。社區大學的學生成績並非很好,但學校的宗旨是幫助社區的學生接受更好的教育。這樣的理念十分打動潘壽安,讓他覺得這就是他想做的事,他想要為社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之後,潘壽安曾到北亞利桑納大學任助教,但他自己還是喜歡社區大學。於是,他抓住機會去費城的社區大學當了四年主管學生工作的系主任。

潘壽安決定,他要在行政方向繼續走下去。他在佛羅里達州的兩個學校當過執行副校長和校長。然後重新回到亞利桑那州的梅薩社

區學院擔任校長,一晃就是八年。八年間,潘壽安帶領學校做了很多服務社區的事情,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也收穫了很多專業人士的認可。西雅圖社區學院總校長招聘的時候,在同事的鼓勵下,潘壽安也加入了競選活動。西雅圖社區學院的董事會由州長任命。董事會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篩選和評比後,選擇了潘壽安擔任西雅圖學院系統的總校長。

華人沒有領導力? 潘壽安做給你看

西雅圖學院系統已經有50多年的歷史,包括4所學校,分別是北西雅圖學院、南西雅圖學院、西雅圖中央學院和西雅圖職業學院,在社區里很受大家的歡迎。因此,潘壽安覺得對他來說是很好的機會,十分具有挑戰性。

首先,華盛頓州政府的撥款跟不上,人力資源也有挑戰。他認為,往後學校的宗旨就是要繼續服務於社區,服務於家庭里的年輕人。就讀社區學院的學生們的經濟情況並非最好,有些學生的經濟條件較差,但為他們服務的使命不會改變。他們是社區學院的服務對象,也是辦學的初衷。潘壽安希望自己和學院能服務於社區,服務於條件比較差的社區。他指出,不管國度怎樣,一個國家的強盛,一個社區的發展發達,取決於年輕人,取決於更多人學會有用的知識和技能,更取決於在今天這個全球性的競爭環境下,社區、州、國家使學生們儘可能多地受到高等教育。

潘壽安分享了自己一步步走來的經歷。他認為華人有自身的優勢,也有弱點。傳統觀點認為,華人只是專業強,並沒有很強的領導能力。潘壽安卻否認了這一說法,他認為自己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內向的人,從來不認為自己能成爲一個好的領導,但選擇走行政這條路之後,他一直

留心觀察身邊優秀的領導人,注意他們都具備一些什麼樣的特點,觀察他們都是如何工作的。潘壽安說,要做一個好的領導者,首先要做好本行,但不能只局限於狹窄的工作範圍,要清楚公司或組織需要的是什麼,清楚如何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二,想要走領導的路線,需要培養自己的表達能力,做行政就要懂得與人共處。對很多華人來說,英語畢竟不是母語,有口音很正常,怎樣學會在不同場合與不同人溝通十分重要。他認為,需要從傾聽出發,真正瞭解對方的想法,瞭解對方的興趣點所在,學會溝通首先在於學會傾聽。

另外,想要在行政道路上有發展的話,要有意識地尋找一個導師或者“貴人”,他們會給一些反饋和意見,督促你不斷提高。總得來說,要知道會有失敗,會遭到非議,會被誤解。他認為,現代社會需要更多的中國人、亞裔學會更好地管理和領導他人。

擔任要職卻遭受不公待遇

潘壽安介紹,他也曾遭遇過不公的待遇,不過他學會了面對這些不愉快的經歷,從中吸取教訓,不斷彌補弱點,一步一步成長起來。

潘壽安介紹,他早年在佛羅里達州的學校擔任副校長時,通過公開競爭得到了這個職位,他全力以赴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但周遭的質疑聲不斷,很多人認為潘壽安之所以能得到



這個職位,並非因為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態度,而是因為他的亞裔身份——學校為了多樣性,才將這樣一個職位給了身為亞裔的潘壽安。他們認為,潘壽安沒有能力擔任副校長。更有人指出,潘壽安說話都有口音,個子又矮,如何能勝任這樣一個領導人的角色呢?潘壽安在自己的評估報告中看到這些意見後,感觸頗深。

潘壽安深知,當時很多美國人對於領導者的角色有固定的看法,需要個子高、形象好等外在的條件,但他卻並沒有因此而卻步。他用自己的行動去證明,做領導並非一定都是這樣的模式,他以出色的工作證明瞭自己,終於在不久後又晉陞為校長。

如今的潘壽安身為西雅圖學院系統的總校長,他笑稱,雖然上任時間尚短,但他已經深深愛上了這個多元化的社區。他希望與社區有更深入的合作,希望社區各界人士提出寶貴意見並積極支持西雅圖學院系統,為學生創造更多機會。

特朗普當選後的中國留學生:局外人和局內人

2016年11月9日的凌晨,我站在曼哈頓中城的希爾頓酒店樓下,這裡是特朗普獲勝後舉辦私人慶祝會的地方。當時,我這個一夜間變得陌生的美國:特朗普的支持者們揮動着旗子,大聲地喊着“lock her up!”(把她關起來);希拉里的支持者們涌來抗議,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們爭吵;世界各地的媒體和幾十輛衛星直播車駐紮在希爾頓樓下,在播報的間隙,主播們表情凝重地整理稿件;小販們帶來一大批“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帽子在人群中兜售,夜色和路燈下帽子上的粉色、紅色和白色都變成了奇異的色彩;NYPD(紐約市警察局)的警車上紅藍相間的警燈掃過每一個人的臉。那個夜晚彷彿有一個世紀那樣長。

我從加州激進的自由派大學走入紐約市另外一所自由派的高等學府,特朗普的當選讓我這樣一個中國留學生窺探到了一個與我的學術小世界完全隔絕的美國。大選前,我對“鏽帶”(Rust Belt)以及這些衰落工業區的政治分極知之寥寥,美國中部對於我是遍布着國家公園的優美的烏托邦;我關切美國的種族問題,但從沒想過一個像特朗普這樣的候選人能夠使得極端種族主義者再次抬頭;我聽了太多受眾局限的話語,甚至幼稚地認為,全球化對每個人都有益處,社會大眾遲早會接受左派推動的進步議題;至於特朗普和他背後的政黨所鼓吹的很多政策,我繼續選擇性地無視,它們在我眼裡是“落後”和“倒退”的化身;在美國四五年的經歷告訴我,人人平等、尊重女性、尊重少數族裔幾乎是無人質疑的共識——直到特朗普的崛起戳破了我所躲藏的那個“自由派氣泡”(liberal bubble)。

特朗普的當選讓深深地感受到,這個氣泡被許多人所詬病。有人認為,它里邊的人本身就是有特權的精英偽君子;它用自由化的理想來粉飾不同的社會利益與價值觀,它用人們厭倦的官僚化的“政治正確”來掩蓋或簡單化種族衝突與深層的歷史、文化、與經濟問題;它把大部分大學與城市隔絕在美國廣袤的郊區與農村之外。結果,它讓那些“聰明的”自由派讀書人無法認同美國另一半的人對奧巴馬與克林頓的激烈不滿。這個支持川普的“另一半”們當中,借用克林頓的話,有不少被主流媒體和建制派政客認為是“可鄙的”人(deplorable)。美國的主流媒體幾乎清一色地在支持克林頓競選。而當這些“另一半”們用選票把特朗普送入白宮,證明瞭自由派一定程度上的慘敗。

也許任何一位中國留學生對美國大選都有“局內人與局外人”之感。

我,和很多留學生的經歷相同,在美國精英們討論的漩渦中讀書,耳目觸及到的都是教授與大學生研究生們之間的探討。特朗普當選後幾乎每個留學生的信箱里可能都躺着一封或者幾封教授發來的郵件,表明自己對大選結果的震驚與沮喪,我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授甚至為了照顧學生的情緒,延後了期中考試日期。這個時候,我們是與他們一體的,我是一個同悲同喜的局內人。我在加州有很多拉丁裔的朋友,他們是受惠于奧巴馬任期的 DREAM Act (夢想法案)的“dreamers”(該法案可以為16歲以前隨父母非法赴美,在美連續生活5年的無案底非法移民提供一條入籍途徑,協助他們上州

立大學等)。我聽過他們講述從墨西哥穿越邊境來到美國的夢一樣的冒險經歷,知道他們因為自己的身份而沒有護照,無法出國,他們的家人在擔憂隨時被驅逐的風險,我的同理心告訴我,我需要為他們做些什麼。我身邊有身為留學生卻不遺餘力為克林頓的競選搖旗吶喊的朋友。也有在克林頓敗選後,聽着敗選演講從紐約的SOHO一路痛哭到東村的朋友。我也不乏在特朗普獲勝後,因為我在社交媒體上的言論而迅速把我拉黑的特朗普支持者。這次大選將會深刻地改變我身處的社會,它挑戰了我的價值觀,它曾經讓我憤怒、竊喜、擔憂。這時我無法單單做一名看客。

而我也局外人,無法投票,無法切實地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感受後大選對個人的直接影響,無法體會例如醫保、種族配額等等熱門議題施行後的利弊。生長在一個政體與美國完全不同的國家,中國留學生們或多或少觀察着這個世界上最矚目的民主國家的選舉。然而這場被謠言、陰謀論、FBI的“郵件門”調查以及桃色新聞橫加阻礙的選舉,彷彿使得這種民主的優越性黯然失色,留學生們又回頭看看中國,彷彿中國不少媒體說的“西方社會在衰退”的戲碼確實正在上演,從小耳濡目染的“西方制度不適合中國”在逐步自我證明。

我曾經在《博客天下》讀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華裔母親選民:收穫了總統特朗普,卻失去了支持希拉里的兒子》,文章暗示了華人移民的投票趨勢:在美國以外出生長大的第一代移民傾向於支持特朗普,而在美國出生或長大的第二代中國移民多數投給了希拉里,因為第二代的華人政治選擇與“社會排斥程度”為正相關。這不僅僅是代際鴻溝,也折射出了觀念結構與具體經驗的區別所導致的對大選的一分為二的期待。第一代移民更傾向於抱團,在華人圈中社交,萬事說中文,使用中國邏輯。而第二代移民從小生長在美國,更為融入,對“納入美國主流,拒絕種族歧視”的期待值更高。留學生如我,彷彿是一個卡在中間的尷尬觀眾:既有第一代移民在中國的成長經歷,又與第二代移民們——我的同齡人們,接受着相同的美式信息與教育。

作為無法投票的“0.5們”,留學生群體內部政治光譜的分化也非常劇烈。“克林頓”與“特朗普”的二元論敘事在許多中文媒體上非常常見。而在許多留學生心中,也許這次選舉最大的輸家,是美國的民主政治體制。在謠言、陰謀論一輪又一輪地被中文自媒體推到大選討論中時,美國的主流媒體也因為克林頓的意外敗選而開始自我反思,這樣的反思搬遷到中文語境後被濫用,成爲了美國選舉體制與媒體衰敗的直接

證據。我自認站在自由派的立場上,沒有明確的政黨傾向。雖然特朗普的當選讓我惶恐不安,但是,許多中國人與留學生在對美國龐大的政治體系和嚴謹的嚴肅新聞業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徹底否定它,嘲弄它,是我更不希望看到的。

從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發佈的一份報告可以發現,美國政治光譜左右兩極的人數都在逐步增加。對於“0.5”留學生們,這樣的分化也同樣在加劇。

在知乎上,支持特朗普幾乎成爲了另一種“政治正確”。有人讚揚特朗普是美國的改革者,不拘泥於意識形態,但奉行實用主義,是美國版的“鄧小平”。在知乎多個幾千贊同的答案中,特朗普被奉爲打破虛偽“政治正確”的“敢說真話的人”。微博上,用戶名為“波士頓快報”的賬號在大選後第二天提問說“大家今天上課/上班的環境氛圍還好嗎?”下面是清一色的留學生在評論,其中一個過四千贊的留言說,“特朗普是反對非法移民,不是反對移民。希拉里上台不全是老墨在這黑着幾年拿身份然後享着我們納稅納出來的福利?留學生但凡想留在這兒工作的都不該支持希拉里……然而希拉里政治正確,左右大波媒體和資本渠道,支持特朗普的哪敢發聲?”也有留言直白地諷刺了無法承受大選結果的“玻璃心”的美國人。這樣的言論極有代表性。留學生中的特朗普粉似乎沒有意識到,他的崛起以及他要打擊非法移民和伊斯蘭恐怖分子的勢頭和言論,應該會在某種程度上,將種族歧視和排斥移民合理化,將種族言論的後果沖淡,讓他們可能因為特朗普當選而更加有底氣去爲所欲爲。

這樣的保守倒退,恐怕也體現在未來對留學生工作簽證的發放政策上。作爲一個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想着畢業後去留問題的美國學生簽證持有者,這次大選釋放出的信號對於我來說多麼又複雜,然而,作爲一個文科生,在我看來,唯一清晰的是未來的藍圖越來越不友好。H1B、綠卡,如何得到這些畢業後最爲急迫和現實的追求,對於許多想要留在美國工作生活的留學生們,答案又模糊了一些。特朗普執政後的不確定性、政策的頻繁更改,以及越來越嚴重的種族問題都成爲了懸在留學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最近幾天的社交媒體上,我的朋友們都在頻繁轉發關於未來留學移民政策預測的文章。雖然很多文章是在捕風捉影,但能從中窺探到他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

如果說畢業後的去留和就業問題尚未到達眼前,那麼“政治正確”被污名化的惡果可能已經在我身邊登陸了。我無法理直氣壯地說接下



來我要講的例子和特朗普的當選有任何因果關係,然而,“grab them by the pussy”(“抓女人下體”),這是特朗普在2005年的一段錄音中對女性極不尊重的一句話,這段錄音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樣的噩夢確實在我的朋友的身上發生了。11月16日,在梅根·凱利(Megyn Kelly,美國福克斯電視台女主播,無黨派人士,在她的新書中披露自己被性侵犯的細節)的新書發佈會上,一名白人男性觀眾邀請我的亞裔女性朋友坐在她的大腿上,還非常挑釁地說“I don't know if this is racist or sexist, or both?”(我不知道這是種族歧視還是性別歧視,或者都有?)。最諷刺的是,梅根·凱利也曾被特朗普羞辱過,在第一次共和黨總統參選人辯論大會上,主持人凱利對特朗普的犀利提問激怒了後者,他對CNN咒罵凱利“她全身到處流血”。

即使在最爲包容的城市紐約,也有人擔心,越來越多的讓人擔憂的言論會被肆無忌憚地釋放。從前一陣子的《紐約時報》華裔記者Michael Luo被衣着得體的白人女性喊“滾回中國”,再到我身邊朋友因爲她的性別與膚色被如此騷擾與挑釁,我很難不把被特朗普的言論所改變的大環境和我身邊的例子聯繫起來。在艾奧瓦州的某高中,一名15歲的伊斯蘭少女被一位素不相識的男生咒罵讓她“回家去”。而她是一位美國公民。在華盛頓,“另類右派”(alt-right movement)在慶祝特朗普的當選,這些蟄伏在網絡上多年的種族主義者們認爲他的當選是社會的一個覺醒。

大選日結束後的第一個周一,在一門國際史的課堂上,我的教授對着班里20多個碩士生和博士生,用疲憊的語氣說:“我可以和你們談談大選,然而我不想談。”而之前的一節課,這個教授還在頻繁抱怨大選日快點來臨以便“一切都能趕快結束”。我的另外一位教授在課堂上用了20分鐘時間讓我們聽剛去世的歌手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未來》(The Future)。這首歌寫於冷戰結束後的1992年,當時世界大變,人們不知道蘇聯垮台後的世界會發生什麼。歌詞說,“還給我柏林牆,還給我斯大林和聖保羅……所有的一切都在惡化、惡化,什麼好事都沒有,沒什麼事情你能再把握得住。”這首上世紀的歌,在這個節點,無比應景。我突然非常同情這些被大選結果打擊到的自由派教授們,他們很多人都成長於民權運動時代或後期,幾乎用了一輩子教授自由派的民主政治,但是這次大選讓他們發現,幾十年的付出有可能只是在破碎的社會鏡面上描畫,他們還對這樣的成果顧影自憐。

11月12日傍晚,我路過位於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廈時,看到樓下的示威者仍舊在逗留。我穿過那些遊行的隊伍,大選日結束的那個夜晚歷歷在目。作爲一個局內人和局外人,能見證這次變革,無疑使得我自己變得更加從容與強韌。我不知道與我一樣的留學生們從這次大選中失去、收穫或是擷取到了什麼,令人更加迷惑的是,真正的變革,還橫亘在眼前,而我們也許對它一無所知。

本文作者:Afra Wang(王昱),畢業于加州大學歐文分校電影傳媒與歷史專業,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世界歷史,現居紐約。